



聊城大学博士文库

汪曾祺小说创作论

汪曾祺小说创作论

◆ 卢摇军摇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1
第一节 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现代意识的 萌发滋长	1
第二节 译介文学影响下的全新的小说观	2
第三节 汪曾祺与阿索林	3
第四节 走向文体综合的实验写作	3
第二章 文学薪火的传承	4
第一节 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4
第二节 汪曾祺与归有光	5
第三节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一脉相传	5

引摇摇言

一摇汪曾祺小说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汪曾祺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家之一。一九九七年逝世之后，他再次引起学界瞩目。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研究者在小说的传统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文体风格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儒道佛思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共识。刘锡诚的《试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追求》，季红真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杨剑龙的《论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识》，石杰的《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可算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还有论者

剖析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有人甚至提出他还受墨家“赖力仗义”的影响等。众多研究者对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挖掘可谓全面而深刻，但忽略了汪曾祺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新审视，他更注重的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合理内涵。由此考察这种传统的现代性，才能更准确理解现代的汪曾祺，小说研究中这方面还是个薄弱环节。

对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渊源，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多数研究者认为，汪曾祺吸收我国古代散文、笔记小说的优良传统，是对我国古典小说中文人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庞守英的《汪曾祺与笔记小说》从思想内容、结构体式及叙事风格等方面探索了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联系与超越；孙郁的《汪曾祺的魅力》分析了汪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在精神气质和艺术内涵上惊人的相似性。有些研究者则侧重研究汪对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借鉴。李陀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一文中认为汪的语言受老舍、赵树理的影响极大。其他研究者则更关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对汪曾祺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章有夏逸陶的《忧郁空灵与明朗洒脱——沈从文汪曾祺小说文体比较》，董瑾的《京派的传承与变异》，柯玲的《汪曾祺与京派》等。研究者还努力发掘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李同涛的《当代小说同艺术世

界的关系——汪曾祺的小说观念》，夏元明的《汪曾祺小说与中国画》可为代表。值得注意的还有汪曾祺的学贯中西，他曾多次提及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声明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但这一渊源影响却鲜有人涉及，只有解志熙的《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的《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柯玲的《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等著作有所论述，而对汪曾祺接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背景及理论思考等研究几乎是个空白。

对汪曾祺小说文体风格的研究，比较系统的是李国涛的《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该文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三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解析。杨志勇的《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则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许宗华的《浅论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及张洪德的《汪曾祺小说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专门对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作了论述。谢锡文的《汪曾祺小说语境分析》，李陀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杜悦的《富于独特美感的语音形象——汪曾祺小说探微》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汪曾祺的语言观进行了分析。另一个比较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席建彬的《回归与拯

救》指出汪曾祺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肖大勇的《汪曾祺小说视角新探》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曾祺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视角。

在对汪曾祺作品进行综合研究方面，黄子平的《汪曾祺的意义》把汪曾祺放到现当代文学史中，考察其复出文坛的意义及原因。对汪曾祺创作全貌的综合考察也逐渐走上正轨，如胡河清的《汪曾祺论》，徐卓人的《汪曾祺其人其作》等由文及人，从作家论的角度对汪曾祺作了全面评述。

北京大学解志熙在其博士论文《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专章论述了存在主义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南京大学陈曙红的硕士论文《论汪曾祺的“随遇而安”》着重分析了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文化精神作为一种生活哲学在汪曾祺创作中的体现。山东师范大学席建彬的硕士论文《回归与超越——汪曾祺现代性灵小说论》探讨了汪曾祺对性灵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二 摇本文内在思路

（一）研究视角

本文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和史的观念，拟从艺术

渊源、文体风格、思想意蕴三个方面，结合对作家本人的研究，重点以西方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及从理论先导到创作的先锋意识，对传统文学的承传和创造性转化，自觉的文体试验及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融汇了中西方美学精神的悲剧思维形态，文人化民间立场中隐含的对“五四”另一种启蒙——“文学的启蒙”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等五个方面为切入点，对汪曾祺小说创作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考察，厘清东西方文化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以及他立足于现代意识上对东西方文化的重构。同时对评论界对汪曾祺小说创作业已形成的定论，诸如传统作家、京派传人、逃避政治、远离启蒙、热衷乡土、无视悲剧、和谐风格等存在的许多误读给予重新评价和认识。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二）主要创新之处及其意义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仍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语境

汪曾祺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力图打通现代与古典的作家；他的求新意识、求变心理也暗合了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创新精神。本文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厘清东西方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及他立足于现代意识上对东西方文化的重构，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以启迪。即将汪曾祺作为一个参照系，思考当代文学应如何寻求西方与

东方、现代与古典、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内在契合点，并通过这个契合点来进行贯通中外文学、融会东西方传统的艺术新建构。

圆汪曾祺小说的“异质性”

汪曾祺是个很难归类的独特的小说家，其小说在当代文坛的出现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但是直到今天，这种“异质性”仍未得到很好的阐明。本文将汪曾祺创作“异质性”的渊源追溯到西南联大，从精神追求、价值关怀、哲学思潮、文化氛围、学术思想等方面，综合考察了这所抗战时期的特殊大学对汪曾祺一生创作风格形成的重要意义。汪曾祺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远早于当代许多作家，他从理论认识到创作的先锋性、异质性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派文学具有先导意义。

圆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关注研究对象

以往对汪曾祺的研究多集中在他 愿年代复出后的作品上，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其实，早在 圆世纪 源年代，他的作品风格就已基本定型，愿年代的创作只是其丰富人生阅历积淀后的延伸；怨年代其小说风格发生一定变化，对人生体悟的悲剧意识增强，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早在 源年代的一些作品中就可窥见端倪。汪曾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小说创作，成为 圆世纪 愿年代当代文学与 源年代现代文学及现代派文学的一

个“中介”。本文的创新之处就是在 20 世纪的宏观文化背景上考察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史论结合，力图达到整体观照，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探讨其意义。

澄清学界对汪曾祺小说认识的某些误区

以往对汪曾祺的定论，如传统作家、无视悲剧、乡土文学、远离启蒙等，都源于对汪曾祺作品的某种误读，本文在全面解读汪曾祺后对他进行了重新评价和认识：汪曾祺是当代作家中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的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是对传统文学融入现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其小说审美风格是和谐与悲悯并存的，刻意抒写了“隐伏”的悲剧；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坚守“文学的启蒙”的传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和民俗文化小说家。

（三）基本框架

研究者们大多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汪曾祺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往往忽略其现代性意味。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涉文坛到 80 年代复出，他始终对现代派文学有着独立的思考。汪曾祺现代意识的萌发始于西南联大。他回忆说：“我在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但是课余时间看的多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的译本。俄国的、东欧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

的、西班牙的。如果不看这些外国作品，我不会成为作家。”本文将具体分析西南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特殊大学对汪曾祺现代意识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汪曾祺小说从创作理念到实践的超前性和独特价值及其对新时期文学的先导意义。

“现代主义”的“现代”不仅仅是个时间名词，它和古典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也体现出“对中国数千年灿烂辉煌的传统和文学的内在精神和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性阐释和转化”。^①在汪曾祺愿园年代以后的创作中，至少包含了两个“传统”：一是古代中国民族传统，本文重点考察晚明文学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普遍认为汪曾祺是在文体层面上与晚明小品文有相似之处，但通过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对汪曾祺创作影响更大的是晚明文学思潮的精神内涵；此外，本文还将具体分析汪曾祺怎样将归有光与契诃夫的艺术精神进行了跨时代的融汇和借鉴。二是中国现代传统，即“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现代抒情小说发端于“五四”时期，周作人首先提出了“抒情小说”的概念，鲁迅以他的《故乡》、《社戏》开辟了抒情小说的新流派，接下来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等延续和发展了这种风格。汪曾祺小说继承这一传统，并把它带入了新时期

^① 杨义：《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世纪反省》，载《文艺研究》愿愿年第一期。

文坛。从“五四”到“新时期”，这条审美线索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汪曾祺是个不可或缺的连接点。

汪曾祺同其老师沈从文一样，比较注重语言文体的建设，他曾说“我大概是个文体家”，对于文体和内容“我是较早地意识到二者的一致性的”。早在 1940 年代他步入文坛时便开始了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追求，认为形式即是内容，是人生的一部分。这种艺术观肯定了形式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实际上与西方形式学派形成了不谋而合的契合，这清楚地表明在 1940 年代汪曾祺的文体观就表现出某种超前性。因而用文体批评接近汪曾祺可能更方便、更准确。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目前，对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研究大多停留在表层，而对其负载着的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分析。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从这个层面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

长期以来，论者、读者都对汪曾祺作品中表现出的田园牧歌情调达成共识，认为他与深刻、悲剧无关。显然这是与他的真实人生境遇及作品实际内涵不相符的，因而牺牲了对这样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的丰富性和矛盾性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了学术界与汪曾祺的隔膜和对他的误读。汪的作品虽与政治结合不紧，但并非像某些评

论家所说的不能正视现实，逃避现实丑恶，他的情感是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汪曾祺不只是一位风俗画家和田园牧歌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悲剧作家，这后一点越到暮年越明显。只有将他的“牧歌”和“隐喻的悲剧”结合起来解读，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汪曾祺才能得以呈现。因此，在新的批评实践中对这一旧的模式作某一程度的突破势在必行。本文将结合汪曾祺的人生经历具体分析他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沈从文对汪曾祺小说悲剧表现形式的影响，以及在东西方文化双重观照下的悲剧思维模式。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针对民间问题展开了激烈争鸣，焦点集中在提倡民间是否意味着放弃启蒙、放弃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走向民间是否意味着排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意味着丧失现代性。通过解读汪曾祺的小说，可以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比较中肯的回答。汪曾祺小说文化意识与审美取向表现出极为突出的民间意识，这使评论界普遍认为汪曾祺的创作不但与政治，而且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保持距离，这是一种比较片面的看法。在他的小说里，民间不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民间是一种理想，反映了一种新的叙事立场，其意义是指向一种非权力形态的文化形态和空间，渗透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写作立场、审美风格。本文将就此论述汪曾祺是怎样持民间立场对“文学

的启蒙”传统进行承传的，以及为什么不能将汪曾祺归入单纯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和民俗文化小说家之列。

（四）研究方法

本文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为主导，同时辅助以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等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学术课题。同时，要真正理解和判断一个作家，不仅要研读他的作品，而且还要了解作家其人，他的生活道路、气质个性等，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知人论世”。本文在分析汪曾祺的悲剧意识、民间立场与童年视角时，把作家本人研究与作品研究结合起来，使分析更能切中肯綮，更具说服力。

第一章 汪曾祺与外国 现代主义文学

迄今为止，评论界普遍认为汪曾祺是一个传统文化色彩较浓的作家。其实，汪曾祺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比当代的许多作家要早。汪曾祺创作风格形成的时期，正处于中外文学剧烈碰撞、融合的文化背景下，这使他的创作有自觉的现代意识。多年以后，汪曾祺曾这样谈及外国文学对他的创作的影响：“我在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但是课余时间看的多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的译本。俄国的、东欧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西班牙的。如果不看这些外国作品，我不会成为作家。”“有一种说法我不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虽然这话最初大概是鲁迅说的。这在逻辑上讲不通。……钱钟书先生提出一个说法：‘打通’。……他所说的打通指的是中西文学之间的打通。我很欣赏打通说，中国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需要

打通，不应该设障。”^①他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力图打通现代与古典的作家。

汪曾祺的现代意识的萌发始于西南联大。他的创作无论在题材的探索、写法的革新方面，还是在语言观念、体裁特色方面都含有显著的现代性，并且对中国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对新时期的寻根派、先锋派小说也起着一定程度的先导作用。“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②这也是汪曾祺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的总结。

第一节 摇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现代意识的萌发滋长

1938 年夏，19 岁的汪曾祺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从 1938 年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后迁昆明，到 1946 年返回北方，前后共计九年

① 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全集》第 1 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② 汪曾祺：《小说笔谈》，《汪曾祺全集》第 3 卷，第 1 页。